

# 后现代史学语境下的考古学

燕生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ising, connotations and meaning of postmodern history,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it to the archaeology. In this paper, it points out quite a few subjectivities in text archaeology materials, the postmodern historical tendency exists in the Chinese native archaeology.

Key Words :Postmodern History Archaeology Native

**内容提要** 简要叙述了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内涵和意义,探讨了后现代史学对考古学的影响。并指出,作为文本的考古资料具有相当多的主观性,本土化的中国考古学已存在着后现代史学思想倾向。

**关键词** 后现代史学 考古学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K854 **文献标识码** A

无论把考古学定位在历史学上还是人类学上,考古学和历史学都是研究过去的学问,广义上,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是没有多大疑问的。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本身就是现代历史学科发展的需要和结果。在中国,一般把考古学看作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些后现代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

## 一 现代史学的特征

在了解什么是后现代史学之前,先介绍下现代史学的特质。

在多数现代历史学家眼里,历史学是通过分析各种文献、考古遗存等资料,运用人类特有的理性思维如逻辑分析、推理,并利用科学手段,来探讨人类社会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各个历史事件内在联系,并解释其发生、发展背景,总结或探讨历史的发展规律<sup>[1]</sup>。人类社会有其内在的一致性,现在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历史是科学,必须用科学和理性思维研究。史学家应像科学家一样,在考察和研究历史时用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完全以旁观者的立场描绘历史画面。

现代历史学是西方近现代社会崛起的产物,其历史观念都以西方的历史呈现为准绳,这些本来只有局部的意义,但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和科学主义,使得西方史学家和哲学家在探究历史的终极意义时,寻求一种大“叙述”,目的是囊括世界所有地区的历史,来揭示历史的内在一致性。于是,像历史进步的观念和民族—国家史学逐渐带上了“普遍”的意义,为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人们所效仿,并以此“重构”和“拯救”了这些国家的历史<sup>[2]</sup>。

用“科学历史学”的观念、历史发展规律之灯探照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及研究,于是就发现,像中国和印度,由于先天缺乏理性和科学思辨,始终停留在“非历史的历史阶段”。因而,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的历史必须被西方的历史学家所表述。显然,否认了中国人有历史观念,也就否认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sup>[3]</sup>。

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实际上是进步或进化的历史观的出现和科学研究方法的确立。中国历史学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借用西方通用的历史演变

话语,把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对应并纳入了西方历史发展格局中。而且,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学——西方的科学历史学之一,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自此,我们习惯于以一个先验的结构来思考中国问题,习惯于用一个个裔出欧美的概念模式解释中国历史问题。

这种历史研究的结果是传统历史的丧失和过去的断裂,用西方现代史学建构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表现为失败的叙事。课题导向变成,为什么我们不能取得欧美已经取得的成绩。对这样的答案往往为,历史是多余的,历史传统阻碍了我们的发展<sup>[4]</sup>。

## 二 后现代史学的兴起与主要内涵

后现代史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伴成品。

科学和理性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往往带来了巨大灾难,如西方发生的种族主义、现代奴隶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以及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清洗行为,都是在科学、理性和改造他人的旗帜下的罪恶行为。现代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得人类看到太多非理性的东西,这些非理性往往就在人的思维和行为中表露出来。理性万能的信念就无法让人信服了。后现代主义学者和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彻底反思。

后现代主义学者和历史学家通过知识考古和解构,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普遍理性产生了怀疑,对西方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也进行了质疑。本来,历史学是阐明理性发展的最好场所,因为历史的研究强调了时间的前后顺序和事件的因果关系。史学家通过对历史的叙述,把原来关系不大的事件都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演变过程,历史学成了人类理性思辨的有利证明。既然人们能揭示过去的发展轨迹,也就可能推测将来的方向。但是,史学家通过对非西方地区的研究,认识到世界并非一个统一体,世界历史也没有所谓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各地的文明自有其发展演化的法则,并不遵循与西方的路线运动,也没有沿着西方历史学家推导出来的历史规律演进。因而,与其说西方的历史具有普遍的意义,毋宁说西方历史只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特例而已。美国当代学者亨廷顿说:“西方是特例,不是常例”。张光直先生认为东西方文明差异主要表现在“延续性”与“断裂性”上<sup>[5]</sup>。因此,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将西方的历史轨迹、历史观念强加于人。而源于西方的历史学的普遍理性和指导性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sup>[6]</sup>。

世界历史和文化所呈现的多元性,已经打破

了原来单一的地域、文化、时间观念认识。没有了这些观念认识,所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也必须重新反省。如,“东方”与“西方”的对应概念,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Said)就认为,所谓“东方”的概念,其文化上的含义,无非是西方人所赋予的,用来与西方的文化相对比,或者反衬后者的优越,或者批评后者的不足,而所谓的东方主义,其根源于西方现代化的排他性,即人为地制造一个“他者”,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超前<sup>[7]</sup>。

新史学的研究成果及观念的更新,如年鉴学派的研究,说明了历史的复杂性。环境、经济、文化、政治、思想以及突发事件等在某些阶段、某些区域都能决定社会的发展。后殖民史学和妇女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欧中心论的批判。

很多理论学家开始怀疑史学是否科学和客观性的问题。一是历史事件都是单一的、不重复的,因而历史研究无法像科学那样验证,历史研究只能通过“理解”;二是强调史学研究的对象与科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指出史学无法像科学研究那样客观中立;三是史家所谓的“历史事实”并不是外在的、客观的、界限分明的存在,它首先是当事人记录下来的自己心中的种种经验和体会,然后又经过史家过滤,转化成了史学家心中的经验和体会<sup>[8]</sup>;四是历史文献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残余”,只能表达的是部分事实,而不是“历史事实载体”,所谓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或社会情景,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的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确切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网下的社会记忆产物<sup>[9]</sup>;五是任何时代的史学家不仅都要受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和制约,而且本人的经验如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也影响其史学研究和著述,因而,客观史学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业已表明,语言学本身有其独立的结构,并不能准确无误地传达人们所表达的思想。因此,有时候我们无法指望“文献”能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即使撇开历史研究所受的史料限制,假设史学家能掌握过去的所有历史,他在写作成书的时候,由于受到语言学的局限,还是无法让他的知识准确地传播出去。

在历史编撰体的研究上,西方史学的主体是叙述体。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叙述体这一形式,必然会让史学家在著述时,不断整理、剪裁那些已经挑选过的史料,加以编排处理,以体现他所叙述的故事的完整性。史学家剪裁史料的目的,就是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情节,使故事变得生动诱人。因此,史学家的工作与文学家创作没有根本不同<sup>[10]</sup>。虽然史学家希望能“如实直书”,充分呈现历史长河的川流不息,但由于叙述的需要,他不得不经常划分历史时期,将历史分割开来,这就表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和解释,因而也与“如实秉书”的原则背道而驰。

大致说来,后现代史学有以下主要内涵。

1. 对现代史学强调历史发展规律和终极目标的解释传统提出了反思性批判,认为历史的演进序列并没有终点可寻,放弃结构主义的、普遍主义的整体史的追求,拒绝启蒙史学所带来的令人压抑的“主导叙事”,否认西方历史学中的“大写历史和西欧中心论”。

2. 解构西方近代史学对历史的建构与第三世界文化和历史的论述,认为没有一种模式和一种理论能贯通世界所有历史。

3. 历史学不是科学,也没有真实性,历史知识只是一种解释或解读,没有真实的历史可言。取消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文史不分家。

4. “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世上没有一件东西不是文本。后现代史学把文献、文物、口述资料或文化现象,都视为一种文本。史料与史实没有根本区别,只是不同的文本而已。所谓原始资料和档案材料,并没有第一手与第二手史料的区分,它们也都是文本而已。古人或历史的当事人,作品或回忆并不一定与事实更接近,古人与今人一样,都只是提供了一种有关过去解释的文本。文本的产生受制于文学形式和文化模式,常常独立于作者和读者之外。许多常用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概念,如社会、文化和政体,都是文本的构造。

5. 侧重于下层文化和历史以及“他者”(非西方)历史的研究,重视多元、边缘和异常历史现象研究。

后现代史学在批判现代史学时,显然有些矫枉过正,有些极端化,如,历史没有真实性,历史学与文学一样都是虚构的,史学建构的过去实况并非真相而是只有用语言组成的自以为真相的东西。由于没有好坏之分,史家就有可能打着后现代主义的旗号,肆意解释历史,甚至发明或制造史料,如此将使得史学界失去学术规范,发展到良莠

不分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地步。

如果撇开后现代史学那些偏颇的、绝对化的、过激的观点不谈,后现代史学还是给我们很多启示的。

其一,由于后现代史学的批判,使我们对历史研究的认识,从研究的目的、手段到形式,从史学叙述方式到历史观念都有全新的认识。

其二,对“大写历史”的否定,也就是对西方近代文化优越性的否定,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目的和成就之一。西方已经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再领导世界历史的潮流。西方文化中的一些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如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也让人怀疑。

其三,后现代史学帮助人们理解了不少认识论上的问题,使人注意到了在理性思维以外的诸层面,在历史研究上,后现代主义让人对历史学家的主观性更为敏感,看到了历史写作过程中的主观意识,甚至下意识、非意识的活动。

其四,在方法上,除了更清楚史料的性质及限度,对于史家本身可能有的偏见,以及史家所透过的语言本身的限度的了解,使我们不只在处理史料时更为慎重,也在研究过程中以及呈现研究成果时,更能注意到许多以前未曾察觉的盲点。另外,在史家着手研究前的“问题性”的掌握上,也因后现代主义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偏差而能有所补正。

最后,后现代史学给中国史学的启示是,中国史学将面临双重挑战,除了抛弃西方中心的偏见外,也要抛弃中国传统历史文献所蕴涵的文化、地域、性别、阶级等华夏中心主义的偏见。

### 三 后现代史学与考古学

历史学家不能无视史料,在方法上也不能脱离科学的标准。若批判性地接受后现代史学对历史的认识,我们应该这样认为,历史是客观的、知识性的存在,由分析和批判性的话语所构成的“过去表象”。一方面,在具体发生的事情和史料的相互关系层面上,可以确认史料的绝大部分是记录者(包括当事人和历史学家)表象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历史叙述(研究)的层面上,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以作为表象的史料为媒介,进一步将史料表象化的二重性表象行为<sup>[11]</sup>。

其实,作为历史学组成部分的考古学,尽管所利用的实物资料是直观的、客观存在的,但也存在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必须承认考古学家用考古资料构建的历史认识也是一种表象行为。一方面,一



处遗址、一件文物、一处遗迹并不能直接说明历史,它们有个转化为考古资料或史料的过程,本文称之为文本化。在这过程中,可以说绝大部分考古资料是发掘者、记录者表象化的产物。而考古学者所编写的考古报告,是把他们认为重要或有意义的考古资料又进一步的整理、选择、重组,以此说明(证实)其学术目的或设想(显然又是一次文本化)。另一方面,在考古研究的层面上,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以作为表象的考古资料和考古报告为媒介,进一步将考古资料表象化的多重性表象行为。就这个角度而言,也可以说考古资料与藉此构筑的历史是客观的、知识性的存在,由分析和批判性的话语所构成的“过去表象”。

作为实物保存下来的考古资料,只是人类活动中部分保留下来的很小的一部分,其保存、遗弃和废弃过程既有人为因素,也有受自然的影响,情况非常复杂<sup>[12]</sup>。遗物中有些被有意选择的,如墓葬的陪葬品、窖藏,而多数是随意遗弃的,如生产、生活垃圾。遗迹、遗物作为人类活动留下来的“残余”,不能简单的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只能反映的是人类活动的部分事实,更不会全是“历史事实载体”。凭着这些材料,考古学者是不能建构全面的、整体的历史的。

考古学者利用的材料多是人类活动留下来的遗迹、生活和生产的垃圾,尤其是各个时期下层社会的遗存,往往是文献(尤其是掌握话语霸权记录者的资料)不被记录的和不被注意的。考古学者以实物资料建构他们比较擅长的领域,如社会经济领域的生计方式、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程度,社会生活中的居住形式、风俗习惯、埋葬习俗,社会制度方面的营国制度、礼乐制度、等级制度等方面的历史<sup>[13]</sup>,与传统文献建构的历史相比,实际上对历史的另一种解读和叙述。这也是后现代史学所提倡、推崇的。就这一点而言,考古学与后现代史学应是“天然盟友”。

#### 四 作为文本的考古资料

后现代史学把文物、文献、口述资料或文化现象,都视为一种文本。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一件实物、遗迹或文件一旦被认定为史料,它就已经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文化系统。文本的基本特性,即文本性就是它的含义的不确定性。文本是复数的和开放的,即每当人们读它一次,它就存在一次,它就像一台制造诠释的机器那样,不断让人对它加以重新理解。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每

次都是不同的,每次都会产生新的意思,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流动的过程。后现代史学认为,读者应该在阅读与解释中占据中心的地位,并且,读者阅读、解读文本的过程是平等的,没有人能宣称他最懂得文本的意思<sup>[14]</sup>,因此,“读者或研究者”水平并没有高低之分。

实际上,作为文本的考古资料也是如此。

在许多人眼里,考古资料(遗迹、遗物)比文献往往是客观的、直接的,更能真实反映或说明历史事实的,在探究历史事实方面,考古资料优于文献资料。此外,对于考古工作者“如实直书”报道所调查、发掘的考古资料就可以了,也算完成考古工作任务了,因此,在多数人眼里,考古报告的客观性也是不容怀疑的。

考古资料的客观性其实就是直观性。遗址、遗迹、遗物不能直接说明过去的历史,只有通过考古学者的叙述才有意义,既要把它转化为史料即考古资料的过程,也就是文本化过程,这具有明显的主观性。遗址、遗迹、遗物必须通过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调查、发掘工作和室内分析才能成为说明某种(些)意义的史料,本文称之为考古材料(或考古记录)。考古发掘者和记录者把发现的遗迹与遗物要建构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文化逻辑序列中,即文本化,其过程包含相当多的主观性、相对性。不但文化逻辑序列和所要表达的历史意义更是主观的,就连考古学家依靠地层学、类型学对遗迹、遗物的编年和放射性元素测定的年代也是相对的。类型学更是考古学家根据自己研究需要所构建的一种分类系统,本身也是一种文本化。

比如,在野外考古发掘现场,不同学术背景、不同研究取向的人、不同工作经验的考古工作者甚至同一位人在不同时期面对同一个遗址(遗址也是文本),所观察的结果是肯定不一样,会形成不同的文本(考古资料)。关注环境的考古学者会对周围河流、土壤、地貌等环境和资源感兴趣,研究聚落的学者则对遗址的堆积形态、内容、布局和功能比较关心,而物质文化研究者就会一心扑在遗址出土的陶器等遗物上。就连一(片)块人工活动的土层堆积(也是一个文本),不同需求、不同目的考古发掘者甚至同一发掘者在不同时期,看法也是不同的,也会形成不同的考古资料(文本)。像在热衷考古文化研究人的眼中,可能把它划归或合并为地层或其它组成部分(该文本的信息也许就从此消失了);对聚落考古学者来说,则考虑其形成原因、功能和与人类活动有何关联;而对环

境、植物、动物、农业考古学家而言,该土层仅是标本抽样的一个单位而已。同样的,对于一片陶片或一件陶器(也可视为文本)也如此。考古文化研究者会关注其颜色、形态、特征等所谓的文化因素;认知考古学者则考虑,为何做出如此形状,为何有如此花纹(或为何没有花纹),这些到底折射出了人们什么样的思想和审美情趣;民族考古学者和生态经济考古学者,就会关心它在哪里制作、是否通过交换、贸易或分配等手段得来的。随着观察角度的变化和科技手段的进步,还能分析出更多的信息。当然,发掘者在编写报告时,若没有把这块(件)陶片(器)当作一个样本介绍,像这件没有任何特色的文物,也许会永远消失在人们视野之内了。此外,即使同一种研究取向的学者,对待同一批遗迹、遗物,也会形成不同的考古资料(文本)和做出不同的判断。这些正是反映了文本的基本特性。

考古报告,作为另类文本,也具有文本的一般特征,其编写,也同样存在着很多的主观性。编写者(发掘者)通过整理、选择、重组考古资料(文本),运用特定的逻辑语句与文本结构来组织资料,把考古资料呈现出来,以期达到其学术意图,这样就制造了新文本。不同的编写者面对同一批材料,也肯定会写出不同的考古报告(文本)。

因此,对考古资料(文本)的判断、分析、研究并没有高低之分,更没有必要用一把尺子去衡量。王明珂先生认为,后现代史学把文物、文献、口述资料或文化现象,不仅视为一种文本(text),而且还视为一种表征、呈现(representation)。“文本”之意为在于与“情境”(context)之互应,而“表征、呈现”则是强调它们在某种社会本相下产生的表象。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情境也赖文本来呈现。社会常以文物或图像构筑,以强化集体意识和社会认同。有意义或能反映某种文化、思想、艺术价值的文物和遗迹还可作为一种集体记忆与社会价值的媒介,它的制造、搜集、拥有、典藏都能够表现所有者的文化倾向、族群认同。出于墓葬与窖藏的文物,从某种观点来看,可说是有意被制造、收集、表达某种社会价值和集体意识,强调文化认同和历史记忆。一块刻着家族谱系的隋唐石碑,碑上的族谱不能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事实,它应被认为是制造者有意要别人相信的谱系。相同的,一个刻着族徽及“子子孙孙永保用”的殷周青铜器,不能当作是华夏移民或定义华夏范畴的客观证据。它有时也代表制造者或拥有者刻意表达的文化偏好

或认同倾向。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蕴含某种社会价值和集体记忆,可将这类器物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的媒介”。因此,流行于考古与历史学界的“二重证据法”也不一定让我们知道更真实的历史<sup>[15]</sup>。

### 五 本土化的中国考古学

20世纪50~60年以来,在欧美国家流行的新考古学和过程考古学,显然是受新史学、结构主义、过程主义影响的产物,或者说这些理论和思潮在考古学上的表现。新考古学者预设出一套中程理论,利用科学手段、计算机模拟实验,运用理性逻辑思维(演绎、推理)来探讨古代的技术、经济、生态、文化、意识形态(各个时期侧重点不一),企图建构全面的、整体的历史,形成所谓科学的考古学。其最终目的是构建普遍主义的理论模式和法则,树立起问题意识、话语、理论和工作霸权。

以新考古学研究的问题和目标为参照系,中国考古学似乎仍处于文化史研究的低级层面上,并有严重的文献癖好和民族主义倾向,还没有走向世界,没有同世界考古学接轨,并成为批判甚至嘲笑的对象<sup>[16]</sup>。这种研究,带着西方特有的问题意识,使用西方理论话语和叙述范式,把先验的理论假设,应用到世界各地的田野实践和研究,用一种解释来贯穿世界的考古资料,这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看来,其目标仅仅是一种幻想,其目的和方法是应当受到批判的。

中国考古学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学术需求。实际上,中国考古学是新史学影响下的产物<sup>[17]</sup>。中国古代文化(文明)之悠久,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导致各地的遗址千差万别,尤其在中国古代文化、文明核心——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古代文化堆积之复杂、遗物(如陶器、石器)之丰富,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仅地层学和类型学在中国就走过了漫长的本土化过程。无论中国考古学史如何写,中国考古学的性质如何定位,它一直是新史学的一部分,考古学者利用多学科,重建中国古代历史的目标和努力,也一直没有放弃。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因经济的制约和课题诉求,利用的科学手段和理性逻辑分析少些,传统考古学、文化史方面研究比重大些,历史化、文献化倾向明显些而已<sup>[18]</sup>。

无论文献导向(趋向)还是民族学、人类学导向的考古学研究,只是提供的一种解释和叙述,都有优点和不可避免的缺陷,不必过分强调和忽视一方<sup>[19]</sup>。不可否认,文献有很多局限性,比如先秦考古,即使不考虑文献的局限如正确或不正确、全

面或不全面,但源于中原商周王朝的霸权话语(文献),至于能否涉及到全国各地并延伸至整个新石器时代是应当考虑的。但文献丰富是中国的优势,文献记录给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和线索。事实上,中国夏商周考古的主流学者,对文献的使用是灵活的、辩证的,如邹衡先生在建构夏商周考古体系中,对夏文化、先商文化、先周文化等问题的分析,商代早期都城、燕国、晋国、西周都城的认识都是基于考古学资料的研究,而不是直接从历史文献角度得出的结果<sup>[20]</sup>。

苏秉琦先生根据中国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提出了文化区系类型、文明起源多中心和形成模式(如“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和发展模式的三个类型(原生性、次生性、续生性)<sup>[21]</sup>等理论和设想。这些是中国考古学界提出的最富有学术含量的命题,具有巨大阐释力和覆盖率。正是这些命题和预设,使得中国考古学完成了从文化史的研究向重构先秦史的结构性转换。这些概念堪称迄今为止最本土化、最有影响力的中国考古学理论。这些命题衍出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理论,就是把中国文化与历史所呈现的多样性与连续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sup>[22]</sup>。严文明先生认为,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走过了一条由大体上是平等的多元一体,到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再发展到多元一统的道路<sup>[23]</sup>。赵辉先生主张对中华史前文明进行过程主义研究,显示出,各地文明从内容到形式,从形成过程到形成背景和原因在不同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sup>[24]</sup>。张弛先生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的演变、区域经济形态的考古探索<sup>[25]</sup>等等,这些都远远超出用单线进化、多线进化和新进化理论(如塞维斯)所做的考古研究,是最有本土化特色的考古叙述。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都应视作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史学思想倾向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考古学在超越历史文献取向的同时,也应摆脱西方(主要是美国)考古学为中心(即在西方考古学中发现问题的)考古学倾向。在重构中国历史中,我们考古界要有自己的、本土化的叙述。

2003年。

- [3]王晴佳:《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在西方的缘起、变化与新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期。
- [4]德里克(Arif Dirlik):《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 [5]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九州学刊》1986年第1期。
- [6]关于后现代史学的产生、主要内涵和影响,本文主要参考了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在此不一一注出。
- [7]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
- [8]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 [9]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 [10]海登·怀特著、陈永国等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11]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
- [12]Michael B. Schiffer:《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7.
- [13]赵辉:《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考古专业五十周年而作》,《文物》2002年第10期。
- [14]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
- [15]王明珂:《华夏化的历程:太伯传说的考古与历史学研究》,《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品编辑委员会1997年。
- [16]Robert Bagley(贝格利):《Shang Archaeolog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B. 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7]杜正胜:《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
- [18]赵辉:《研究史中所见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日文),《考古学研究》47卷第1号2000年。
- [19]唐际根:《考古学·证史倾向·民族主义》,《三代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04年。
- [20]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 [2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社1997年。
- [22]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 [23]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
- [24]赵辉:《中华文明的曙光》,文见严文明主编,《中华文明史》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25]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1]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对现代史学的表述多大同小异,可参照张艳国:《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

[2]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